

# 近代江南俞氏家族的文化记忆

## ——以《俞鸿筹日记》为中心

潘悦<sup>1</sup>

(北京大学中文系, 北京 100871)

**【摘要】:** 江南地区人文气息浓厚, 文化世家数量众多, 贡献卓著, 江苏常熟俞氏堪称其中代表。上海图书馆藏俞鸿筹日记手稿内关于家族的文化记忆非常丰富。俞鸿筹在追忆中自觉承传家族传统, 赓续人文家风。他为家族保留文化遗产, 苦心编纂俞钟颖年谱和别集; 他倾力建设乡关文化, 参与《重修常昭合志》项目, 编纂《松禅老人逸事》《杨沂孙集》, 为名人耆旧坟墓被盗、铁琴铜剑楼藏书捐出二事发声; 他坚持存续古学, 在动荡变化之际, 以疲惫衰朽之躯勤苦治学, 读书博涉四部, 札记多有创见, 诗歌学养深厚, 充分展现了俞氏家族代代绵延的文化传统。中国文化之传承, 往往有赖于俞氏这样的文化家族。

**【关键词】:** 近代 江南俞氏家族 俞鸿筹 日记 文化记忆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:** I206.5 **【文献标识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001-4403(2022)04-0154-11

明清以来, 江南地区人文尤富, 催生出众多文化世家, 如钱塘钱氏、海宁查氏、昆山归氏、常州庄氏、无锡秦氏等。<sup>1</sup> 江南文化世家大多历时悠久, 注重文教, 人才辈出, 阵容庞大, 藏书丰富, 成果丰硕, 对一地、一国的文化形成和传承贡献巨大、影响深远。这些, 我们从常熟文化世家后人俞鸿筹手稿日记<sup>2</sup>中多有体会。

文化记忆具有面向过往和当下的双重功能, 一是“家属有义务在记忆中保留死者的名字, 使其流传后世”, 构建其世俗体系中的声望<sup>3</sup>; 二是记忆“寻找着已被埋没的痕迹”, 重构当下的意义, 为生者提供身份认同。<sup>4</sup> 俞鸿筹日记, 恰好体现了文化记忆的这种双重功能。该部日记详记家族人物的文化活动和事件, 展露个人身份认同和文化修养, 对探讨江南俞氏家族及其文化传统、社会文化贡献具有重要意义。俞氏日记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都颇丰富, 但鲜见有人发掘利用; 对俞氏家族以及俞鸿筹其人的考察也欠详实。本文不揣浅陋, 以俞鸿筹日记为中心, 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考察。

### 一、江南俞氏家族及其文化传统

江南俞氏家族从明代到新中国, 绵延十余代, 阵容庞大, 家声不坠。今据俞鸿筹日记所存家族信息、《清代朱卷集成》所收俞钟颖同治十二年(1873)癸酉拔贡朱卷<sup>5</sup>、辽宁省图书馆藏俞钟銮《彭城俞氏世谱》一卷、《常熟市志·人物编》俞钟颖及俞钟銮小传, 可以大致勾勒出俞氏一族的谱系。

俞氏家族的始迁祖为金爱溪, 明朝时由安徽休宁县迁居江苏常熟, 生子绍姿, 承外家姓, 遂为俞氏。绵延至四世祖俞克定一支始有仕宦者。《世谱》云: “覃恩者, 自静公公始。”<sup>6</sup> 俞钟颖和俞钟銮同为克定六世孙, 俞克定生六子, 其中二子为俞玉珍和

<sup>1</sup>作者简介: 潘悦,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, 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、近代日记文献整理与研究。

<sup>2</sup>基金项目: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、整理与研究”(项目编号: 18ZDA259)的阶段性成果

俞锦，俞钟颖属俞玉珍一脉，有俞鸿顺和俞鸿筹二子；俞钟銮属俞锦一脉，有俞承莱和俞承修二子。俞钟颖与俞钟銮昆仲情深，据郑逸梅言：“常熟丁大风，家有藏札，分贻若干，具见深情。如俞钟銮、俞钟颖两昆仲，为虞山耆宿。”<sup>7</sup>

俞鸿筹的父亲俞钟颖(1847—1924)，字又澜，号祐莱，同治十二年(1873)拔贡，光绪二年(1876)顺天乡试副榜。九年，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、总办章京兼同文馆提调。二十二年，外任湖北荆宜施兵备道兼荆沙关监督，调署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，历涉外务，张之洞称其能。后因母老乞归。三十三年，复授广东琼崖兵备道。宣统二年(1910)，升广东按察使，次年，迁河南布政使，平生卓有治绩。著《南郭草堂诗文集》《归田集》《彤斋奏疏文牍存稿》《彤斋随笔》《遁渔随笔》等。俞鸿筹深切服膺于父亲的政能文才，一心为父存史立传。

俞鸿筹的叔父俞钟銮(1852—1926)，字次辂，一作养浩，号荆门，一作金门，前清举人，翁同龢外甥。光绪年间拨私财建琴南学堂和儒英学堂，分班授课，成材众多；又立琴南医社，集医士施诊，以恤贫士。积极参与《重修常昭合志》工作。喜好诗词，与舅父翁同龢唱和频繁。俞鸿筹于日记中抄录其诗，亲切唤其“养浩叔”“金门叔”。俞钟銮二子亦是一时精英。俞承莱(1881—1937)，字彩生，一作采笙，笔名天愤，是近代中国开创侦探小说的先驱之一。据日记记载，俞鸿筹与彩生兄常有诗书交流。俞承修(1894—1967)，字志靖，是中国近代著名民刑法专家，俞鸿筹在日记中唤其“志靖兄”或“骧哥”，据日记自述，二人走动频繁，时常互赠食物，携示书画，道贺生辰。俞承修受俞鸿筹之托，校正俞钟颖诗文，而俞鸿筹也应俞承修之请，整理俞钟銮书目，并抄录遗稿。不难看出，俞氏家族第十一代后人寓居上海，在政事、学术、文学各领域继续开拓，往来密切，共使家声不坠。遗憾未能参与其中的，是俞鸿筹早卒的兄长俞鸿顺。

俞鸿顺，字遇之，娶翁斌孙女<sup>8</sup>，生平事迹不详。据俞鸿筹庚寅(1950)六月十八日记“兄卒于己未三月，筹时在塾，方习韵语”，“兄殁已三十余年，筹年已过兄享之岁”，推断俞鸿顺卒于1919年3月。俞鸿筹虽幼失兄长，但对其记忆清晰，如“犹忆筹髫髻时，兄曾指示习字，口授唐诗，亦尝携登山麓，以共游眺，情境犹可仿佛”(1950.6.18)。又如己丑(1949)九月十四日记道：

《鸣竖白斋诗存》有《书研拓付俞氏甥》七绝两首，系赠遇之先兄者。……诗云：“……无忌当年曾似舅，吾甥好古亦同吾。拓成百幅<sup>9</sup>妃影，付与收藏当画图。”

《鸣竖白斋诗》的作者沈汝瑾(1858—1917)，是俞鸿筹与俞鸿顺的舅父。其人工诗文，善书画，好藏金石书画。由这首赞叹外甥与自己趣味相投的诗，可以看出俞鸿顺亦雅好金石书画。又如庚寅(1950)六月十八日记道：

遇庐先兄遗稿《礼宿吟》一卷，都七绝，一百二十八首。按之诗中纪年，当系甲寅夏秋间所作。……一日先公示以此卷，抚而叹曰：“诗多比兴之体，乃无自注，恐汝辈终难索解矣。”……先兄著述甚富，有诗文、随笔、题跋、日记若干种，手选历代七言绝句五六十卷，嗜金石，成集古印谱若干卷，皆付侄辈保守。……署曰礼宿者，体为七绝，符二十八宿之数也。其诗有读书漫兴，有碑图题咏，有寄情景物，有陶写胸怀，则可识也。至其纪事不著其因，寓言别有所托，隔时既远，冥索实难……沈抱一表阮，兄之子婿也，秀雅能文，善书画篆刻，惜联姻已在兄殁之后，而不及见……

由此可知，俞鸿顺著述宏富，可惜毁于战火，仅存《礼宿吟》诗集一卷，内收128首七绝，系1914年夏秋间作，其诗内容丰富，多用比兴，因缺乏自注，故不易理解。俞鸿筹还提到俞鸿顺的女婿沈抱一，沈抱一出身于常熟“大步道巷沈氏”，该家族的代表人物为沈煦孙、沈养孙兄弟，皆为民国著名收藏家。沈煦孙(1868—1942)，号师米老人，喜爱历代书画，各种版本书籍，凡藏家之物，无不悉备，藏置处曰“颂庐”“师米斋”“芥弥精舍”。<sup>9</sup>沈抱一(1914—1993)是沈煦孙的第三子，名道乾。1937年11月，日军攻陷常熟，师米斋惨遭抢掠，沈抱一继承了部分遗存。俞鸿筹在日记中常提“假阅师米斋沈氏藏物”，便是从沈抱一处借书。沈养孙(1869—1932)，字彦民，藏书楼曰“希任斋”，常熟沦陷后，沈养孙第四子沈芳畦携书避乱，保存下六七成希任斋藏书。<sup>10</sup>他编成《希任斋善本书目》四卷，请俞鸿筹作序，此序全文载于俞氏日记辛卯(1951)一月三十日。

日记主人俞鸿筹(1907年6月26日—1972年2月1日)<sup>11</sup>，字运之，少富诗名，与乡人创办虞社。稍长赴上海求学，肄业于吴淞中国公学，后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法文，又转入上海法政学院攻读法律，民国28年(1939)毕业。日本侵华期间，加入青年组织，在上海从事地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工作。民国34年(1945)初，在杭州遭日军逮捕，移禁上海提篮桥监狱。抗战胜利后，负伤出狱。民国35年(1946)辞职，皈依佛门，著述自娱。

江南世家之间联系紧密，世代联姻。世家子弟迎娶具备文化修养的世家女性，有利于书香与风雅的延绵不断，实现家风与家学的融汇整合。<sup>12</sup>俞氏家族女性多才多艺，才情颇可称道。俞钟銮妻钱云辉，字织孙，生于浙江归安，著《慎因室诗稿》《冰凝镜澈之斋诗文集》；俞彩生妻姚鸿茜，字琬莹，著《纫芳室集》《南湘室诗集》；余承修妻恽元箴，字琬如，有《靖宇室诗钞》。<sup>13</sup>单士厘《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初编》收录三人诗作，评曰：“(织孙)于归俞氏，倡随至乐，两子妇均能诗…所作诗文词多关名教风化之作。”“(琬莹与琬如)均秉姑(织孙)教，能诗。《九秋吟》本姑媳分咏，兹各录其题词，以征家庭赓咏之乐。两甥妇目前诗境已自不凡，他日所造正未可量。”<sup>14</sup>此外，俞钟銮女俞承禾亦有诗集《椒花馆诗草》。俞氏闺秀的文化素养可见一斑。俞鸿筹的妻子庞镜蓉也出身名门，是文化底蕴浓厚的庞氏家族之女。郑逸梅赞其“书画韵语，都有一手”<sup>15</sup>。据档案记载，庞镜蓉于1932年8月至1935年1月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中画系，擅长花鸟画。<sup>16</sup>俞鸿筹在日记中记录诸家对庞镜蓉所画百花屏条的题咏，徐虹隐称“万千春色上毫尖，散碧分黄写素缣……闺阁几家传画史，有人郑重记牙签”，张隐南称“搓胭拏粉色交加，凉味香痕透绿纱。一把西风真玉骨，秋花毕竟胜春花”，杨无恙称“陌上花开日，闺中万象春。燕支山尚在，花草自精神”(1950.5.30)，对这位闺中画手的画技及其背后的精神风骨都赞誉有加。庞镜蓉还擅长诗词创作，有词《金缕曲》云：“国脉危如此！凶猛回头朱明赵宋，沦亡胡骑。一样江山谁断送？枉说干城重寄。睁眼看风云变异。糜鹿荒台千古恨。更何人重数吴宫事？肠断也，事如是！临风忍丽新亭泪，想斯时北门东表，尘迷天地。何处尚留干净土？方寸桃源梦里。只赢得雄心未死。午夜蛩尤光射月，斩妖氛提剑闻鸡起。休负我，屠龙技。”<sup>17</sup>襟怀格局不同寻常，堪称女中豪杰。

俞鸿筹与庞镜蓉育有一子，俞氏唤其“申官”，据日记“申官高中毕业，投考工学院，今日报载录取，惟尚需登记补缺”(1950.8.10)，见出俞氏家族适应现代教育制度，在代际延续方面具备与时俱进的能力；从“申官自京回，携赠故宫博物院印宋人画册，中有马远、李嵩、陈居中、李迪等作品”(1955.4.21)能看出，申官对家族的文化修养和风雅趣味亦有继承。

总之，常熟俞氏一族的文化传统代代延续，风雅之气绵绵瓜瓞。无论族人寓居常熟，还是上海、北京；无论族人是从事文学、艺术工作，还是政治、法律、工业，都重视培育自身文化涵养和传承家族文化风气。

## 二、俞鸿筹对家族文化传统的记忆与继承

俞鸿筹自觉继承了家族的文化传统。一方面，他留心保存家族文化遗产，主要致力于整理先公遗稿，为其编纂年谱、别集，日记中多有对父亲的追忆。另一方面，他延续了俞氏家族建设乡关文化的传统，参与《重修常昭合志》项目；由于对常熟籍文人翁同龢、杨沂孙格外熟悉，他还编纂了《松禅老人逸事》和《杨沂孙集》。

俞钟颖著述散佚严重，《朱卷》注明缺文，《常熟市志》记载其著述均未刊行。俞鸿筹四处搜求，己丑(1949)八月二十六日记录了其父诗文稿存佚情况及补辑編集之困难：

府君手订诗文仅及三十岁而止，不孝曩日即思依据遗集及执友函牒补缀成编。奔走在外，卒卒不果。丁丑寇乱，寒斋虽免劫火，所藏书籍文字散失殆尽。先人遗稿曾分寄乡村，在西郊庞祠一部，亦为寇毁，其余幸得无恙。事后清点，可备年谱之资料，几失其半，此无可补救之损失。……今夏重检丛残，先行按照年月一一论次，其中偶有数年事实无存，只能暂阙，日后如有所得，当随时补入。惟念府君弃养日早，筹又幼失长兄，洊经丧乱，海内可以质疑诸父执零落几无存者，往往有所疑问。独对故编踌躇终日，或终于不得尽悉原委，勉强补辑，辄将先集及往来函牒附注其下，俾明出处，遗漏失次所不免焉。

据日记记录，至1953年，俞鸿筹编成俞钟颖诗文集(内收《庚申遇乱记》)，托俞承修校正，俞鸿筹二校并编目，金叔远作

序。同时，汇录先公所撰挽诗挽联一卷，署曰《春音集》；抄录、点校先公《彤斋随笔》一卷，并作跋语；散记友人挽先公之联与诗。最为繁重的任务是编纂先公年谱，俞鸿筹熟阅翁同龢日记和手札、李慈铭日记、张佩纶日记、张之洞奏稿、陈芟声日记，从中摘取先公资料，结合先公函稿，编成《年谱》，孟龙撰序，金叔远撰跋，拟乞翁克斋撰跋以识昔年交谊，未知是否作成。且得庞蘅裳校正，应潮题诗二首。俞鸿筹还记录了先公用章，据甲午（1954）五月二十八日记，俞钟颖已亥归养后，镌有“诏许养亲”小印，辛亥归田后，镌“诏许归蓬荜”“草间偷活”“八表同昏”“苍茫万感”诸印。

俞鸿筹时常梦见父亲。己丑（1949）十二月二日记：“昨梦见先公似在家中，仪容一如往日。余禀以年谱已简略续成，并以《翁文恭日记》所载日使宴恭邸，李相等总署诸大臣偕父亲及罗丰禄同往，当日如何情形为询。先公笑颌之曰：‘我久已忘之矣。’”俞鸿筹虽对其父仪容着墨不多，但仅凭一笑一语的细节，一个温柔敦厚的长者形象便跃然纸上。壬辰（1952）八月二十二日记：“昨梦侍双亲小饮，先公辄然色喜，面容红润，丰硕似七十前情形，且笑且语，旁有客数人，余则在末座。醒而思之，犹在目前。”俞鸿筹粗笔勾勒其父的音容笑貌，简短描绘中满载着思念。除了父慈子孝的温馨场景，俞鸿筹还会忆起父亲管教甚严的一面，庚寅（1950）二月十九日记：“昨梦先公以不肖行为有失检处，大加呵斥，长跪泣求，怒过方已，依旧儿时情况也。”俞鸿筹家中挂父亲画像，其《题甲午日记后》诗云“犹有孤儿拜画前”（自注：“先公乙卯岁画像，今日装成。”），每逢父亲生辰、忌辰，便虔诵佛经，足见父子情深。

俞钟颖光绪年间任总办章京时，为翁同龢下属，再加之翁俞两家的姻亲关系，二人在公私领域皆有交集。俞鸿筹编纂先公年谱时，《翁文恭公日记》成为重要参考文献。俞鸿筹对《翁文恭公日记》极为熟悉，时加援引。甲午（1954）五月二十六日记道：

陆平原《平复帖》。伯鹰言：“陆士衡《平复帖》墨迹，今在中州张伯驹处。”《翁文恭日记》曾记此帖云：“《平复帖》手迹，纸墨沈古，笔法全然篆籀，正如秃管铺于纸上，不见起止之迹。宋高宗题签，香光跋。此卷为成哲亲王分府时，其母太妃所手授，故以‘诒晋’名斋。……恭邸以赠李兰荪相国。”

俞鸿筹在记录陆平原《平复帖》的收藏、流传情形时，不禁忆起《翁文恭公日记》中的相关记载。翁同龢日记手稿行书潦草，辨认困难，此处俞鸿筹援引的当系翁同龢光绪七年辛巳（1881）十月初十日的日记手稿（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予以影印）<sup>18</sup>，其中“诒晋”一词，为成亲王斋名，俞氏辨识无误。但1970年台湾赵中孚编《翁同龢日记排印本》讹作“治晋”<sup>19</sup>，1989年中华书局陈义杰小组整理的《翁同龢日记》讹作“福晋”<sup>20</sup>，2012年上海中西书局翁万戈编、翁以钧校订的《翁同龢日记》亦讹作“福晋”<sup>21</sup>。借助俞氏手抄，今人《翁同龢日记》的整理失误可以得到部分纠正。

俞鸿筹编撰的《松禅老人逸事》，现藏上海图书馆。俞氏将搜集到的翁同龢逸事记录于日记中。如甲午（1954）六月六日：

松禅老人逸事。请兄言老人与吴三先生儒卿最善，归田后，时相过从。先生性狷介，偶与老人作山水游，辄畏人所见。某冬，冲天庙前羊肉面馆新开，老人约先生清晨往，甚早，食罢，客尚无至者，大喜。翌日又继之。及出，一地保见之，遽向老人屈一膝行礼，老人不得已颌之，而先生则已疾走他去矣。后遂不复往。

这一生活镜头正可弥补正史缺憾，描画出翁同龢可爱有趣的一面。又如甲午（1954）十月二十五日：

光绪丁酉江南乡试考题。丁酉江南题为“文学子游”，主考刘恩溥。相传其时松禅老人正为师相，言子乡人，故特截此《论语》句为题。

乡试命题缘由本不见于文献记载，通过此则材料，可以得知翁同龢因子游是常熟先贤，而将光绪丁酉江南乡试题设为“文学子游”。诸如此类的逸事记录，有助于丰富后人对翁同龢的认识。

俞鸿筹还编纂了《杨沂孙集》，二十一卷俞抄本《杨沂孙集》今藏常熟图书馆，系庞镜蓉捐赠。按俞氏日记所言，他先根据

沈抱一所藏《濠叟诗文稿》四册(思赞手录,赵惠甫商榷,书眉三百余页)、《文字说解问讹》四卷(杨濠叟曾孙完襄手抄本)、参考沈芳畦所藏《濠叟日记》手稿一册,将杨濠叟遗著四种订成六册,一文,二诗,三箴铭、杂著,四《文字说解问讹》。随后又从沈抱一处借到师米斋旧藏杨濠叟手批《积古斋钟鼎款识》四册,俞鸿筹将杨濠叟眉评汇录为一卷,共三十页,言“此可附入全集内”。通过以上日记记载,俞氏所编《杨沂孙集》的部分文献来源和阶段性成果得以揭示。

除了关注俞钟颖、翁同龢、杨沂孙这几位知名乡贤,俞鸿筹对与常熟相关的文史资料都格外留心。如其日记所记:“李合肥朋僚函稿中载同治元年盘踞常熟之骆国忠投降事件前后甚详,摘录函语,略加贯串,以便浏览。”(1951.2.25)“录元人陈高《望云图诗序》,因其为海虞文献。”(1950.7.11)俞氏主张将乡邑故实考证清楚,如日记记道:“《居易录》:‘平湖陆稼书先生以御史台罢归,授徒常熟,逼岁除乃返,抵家顷之,卒。年六十三。壬申冬十二月二十八日。’此有关我邑故实,其馆于何氏?弟子何人?前后旅虞时间均应一考。”(1949.8.24)“权德舆撰杜佑墓志铭:‘夫人安定郡梁氏苏州常熟县令幼睦之女也。’唐时常熟县令梁幼睦,未识邑志有无记载。”(1949.5.31)俞鸿筹的得意之作,是考证出明代遗老逸休道人为常熟先贤褚膺。过程如下:

彩生大嫂以旧藏明季遗老《逸休道人诗稿》嘱题。已有松禅老人、邵息盒、沈石友、刘石香、萧毅如、丁初我诸先生题诗,先公亦有两绝。稿内不著姓名,松禅老人以“河南为氏膺为名”之句为孤证,余又检得《送孙本芝诗》复有“膺也敢忘言”句,确定膺为道人之名。乃遍查县志,竟获悉道人褚姓,名道潜,字休庵,原名膺,江西按察副使圻之后。通古今,有干略。常谒史忠正可法于军前(故有《从军集》),甚见宾礼,寻归隐。诗句如“三年读史胸多垒,十载弋弓臂不仁。纲常自许人千古,意气聊归酒一尊”,抑塞磊落,自是奇士。(1950.3.24)

因《逸休道人诗稿》有翁同龢、邵息盒、沈石友、刘石香、萧毅如、丁初我、俞钟颖等人的题诗,俞氏猜测逸休道人也是常熟人,然而稿内不著姓名,他查检文献,水落石出后,激动地说道:“三百年潜名埋姓之邑先辈遗稿,一旦竟为小子发其幽闭,为之喜而不寐。”俞氏既为个人的学术突破而自得,更因自己能为乡邑先辈存史立传、不使其籍籍无名而喜悦。他还专门作诗,以识墨缘,《题逸休先生诗草》其一云:“氏补瞿劬传,碑留孙叔名。残编孤证在,坠绪一朝明。见复搜求广,瓶庐考核精。怀哉二饶集,奇士概生平。”<sup>22</sup>足见其对这一发现的珍视。

俞鸿筹关注常熟资料,固然受到协修常昭合志的影响,更为其深重的乡梓情结和自觉建设乡关文化的担当意识所驱动,是其家族文化记忆的复活。常熟向来以名人辈出、藏书珍贵享誉海内,书香世家之间联系紧密,互相帮衬,后代们受惠于家学与乡谊,多成一代翘楚。俞鸿筹即是受此恩泽的一员,对家乡怀有强烈的认同感与责任感。据日记记载,他曾为新中国成立后常熟地区发生的两件事情感到愤慨痛心。其一为名人遗冢及耆旧坟墓被盗墓事件。庚寅(1950)六月三十日记其致县府请禁掘墓之风的信稿:

近迭据同乡面告,常熟西北两山区所存历代名人遗冢以及耆旧坟墓,自去年起先后被掘,为数极多。虽经政府布告禁止,然并无效果,依然到处发掘。其中著名者计有明藏书家大河秦四麟,清浙闽督季芝昌、相国翁同龢之父大学士心存、学政邵松年、太史陆懋宗、方伯俞钟颖之父俞镜清等数十家坟墓。此皆载在县志,为地方之古迹,一朝毁坏,闻者莫不叹息。窃见政府对于保全古迹,业已屡次申明,最近报载文物局长郑振铎为南京古墓七十余座被掘,特发表谈话:“各地古墓古物,必求妥善妥善保护,以存历史或文献上之遗迹。”此项用意,人民极为赞美。至于私家坟墓,虽未列入古迹之内,但盗掘行为,政府悬为厉禁。想必积极执行,以维威信。

在俞氏的评价体系中,名人墓冢有远超一般私家坟墓的公共价值与意义,秦景昉、季芝昌、翁心存、邵松年、陆懋宗、俞镜清等人之墓被毁坏,不利于保存常熟一邑的历史文化。

另一件事为铁琴铜剑楼藏书让与北平图书馆。日记披露了俞鸿筹对此事的态度:

闻铁琴铜剑楼藏书日前让归北平图书馆,四大藏书家从此悉成历史名词矣。《澗于日记》曾载光绪癸巳六月:“沈子眉来,云常熟瞿氏藏书有出售意。”宣统时,端午桥劝将书献,均未成事实。百年长物,一旦弃捐。此有关吾虞文献,不仅私家世泽已也。

(1950. 2. 9)

瞿氏铁琴铜剑楼历史悠久，藏书珍贵，闻名遐迩。俞鸿筹曾赞扬道：“若以美富而论，琴剑楼诚巨擘矣。”（1951. 3. 16）在俞鸿筹看来，铁琴铜剑楼藏书不仅是私家世泽，而且关系常熟全邑。宣统年间，端午桥两江总督端方以官位相许，瞿氏尚能婉言拒绝献书要求。而此际铁琴铜剑楼藏书却“菁华尽去”（1950. 2. 25），俞鸿筹的不舍与遗憾十分明显。他听闻捐书的消息后，写诗赠瞿凤起：

闻铁琴铜剑楼藏书易输，追赋作此以慰凤甥：

澜语当年尽子虚，箕斋记事复粗疏。登瀛枉下宣和诏，未献王家镇库书。（自注：端甸斋曩劝献书，许酬京卿。良士表姊丈婉却之。“宁登瀛，不为卿”，宋谚也。）

青箱长物日摩挲，输限应知感慨多。谁分南唐李后主，凄凉挥泪别宫娥。

秘笈空怜饭一炊，区区聚散有何奇。郑堂易米还留记，绝胜庚寅一炬时。（1950. 3. 10）

开篇直言作诗劝慰瞿凤起，已表明俞氏坚信瞿氏捐书并非自愿。颌联正是指向宣统年间瞿氏拒绝用藏书换官位一事，借古讽今，见出铁琴铜剑楼藏书在俞氏心中的分量和地位。

不难看出，俞鸿筹在追忆中自觉继承了家族文化传统，力图保留家族和家乡的文化遗产。他与杨无恙、沈抱一、沈芳畦、瞿凤起、薛佩苍、钱仲联等常熟籍文人、收藏家交往密切。他关注家乡的消息，为古迹损毁义愤填膺，为藏书捐弃黯然神伤，为同乡先贤立言扬名，为重修邑志贡献力量，这皆离不开俞氏一族家教、家风、家学的熏陶。

### 三、俞鸿筹承传记忆的自觉努力与必备修养

对家族文化的记忆与承继，涵育了俞鸿筹的个人气质，促使其拥有一份独特厚重的古学情怀。他在动荡变化的时代，以疲惫病躯，努力治学，提升修养，守护家族的文化传统，致力于为后人续写俞氏家族的文化故事。

俞鸿筹亲历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，其人生遭受了从锐意从政、积极救世到远离政治、闭门读书的巨大转变，所遗七册日记手稿，起于1949年1月1日，迄于1955年12月31日，正作于其人生后半程的避世时期。俞鸿筹曾用白居易“老慵自爱闭门居”来概括这一阶段的自己，归隐遁世之意明显。

避世的主要原因是身罹重伤，肺疾严重，形容枯槁，钱仲联《俞运之先生传》形容其“因被敌讯，负伤出狱，后致肺疾，经西法割治，年未中身而体就衰”，郑逸梅《俞运之小传》云“伤重无复人状，幸而中华胜利，始得释放入医院治疗，抽去肋骨数根，遂成偏废，不便行动，生活维艰”，俞氏日记自述道“左肺乳下发声稍异平常……恐系上次发炎后结痂所致”（1951. 1. 30），“黄昏时无故咯血”（1951. 4. 9），“右肺尖有斑地痕五点，为纤维性，已硬化”（1952. 7. 21），体重仅为“九十六斤”（1951. 7. 11），俞鸿筹的孱弱衰朽可以想见。

肺疾不仅折磨俞鸿筹的身体，更使其内心煎熬，忧虑较重。日记呈现出他对健康长寿的极度渴望。他曾自字“柏饮”，以期能像赤松子一样长寿（1951. 2. 6）。他四处问诊，如“致马东海信问肺病可服白芨否”（1949. 6. 1）；辗转求药，如“近有肺病药在港出售，托姨甥孙君从广州市上辗转购得三百片，极为不易”（1952. 10. 24）；学习时下流行的“因是子静坐法”（1949. 5. 7），试图通过修炼气功来调养身体，并且定期摘录杂志报刊、中医典籍中的养生要旨。此外，俞鸿筹正式皈依，以佛法安置身心。

日记云：“今得皈依，自即日起，永当长斋以忏宿业。”（1949.10.10）他接受佛家病系宿障之说，期盼通过持斋念佛消除病魔。他虔心向佛，年终说道：“此一年中处境甚劣，旧疾屡发，身体不健，环顾世事，正在革变，诚剥极矣。惟窃慰者，幸得皈依三宝，稍读经典，使身心俱安，不为世所移转，故自字曰‘无闷’。乐则行之，忧则违之，确乎其不可拔，斯‘无闷’之义也。”（1949.12.31）足见佛学使其深感慰藉。

虽然时代急剧变化，自身又受病痛折磨，但是俞鸿筹未曾改变延续家族文化传统的决心。日记己丑（1949）八月二十七日云：

鄮虞师书来，颇有抑郁语。今日复一函，有“世乱纵靡有定，古学绝不消灭。天留老眼以观世变，行见希夷叟，终有堕驴一笑之日也”之语。

对俞鸿筹来说，坚持读书治学，有存续古学的意义。他读书勤苦，治学用功，几乎日日作札记。日记“今日体似不适，仍照常阅书”（1950.3.25）反映出其勤学不怠的品质。俞氏读书博涉四部，札记常涉考辨，专撰序跋，其中暗藏诸多有价值的发现和思考。比如推断天尺楼钞本《恸余杂记》为清代禁书。

该书直书清朝圈田、放债、强占民房等斑斑劣迹的态度引起俞氏注意，他查检到《征访明季遗书目》未载该书，结合该书没有序跋呈现流传情况，于是推断“当日必在干禁书籍之列”（1952.3.21）。又比如关于杜牧诗的心得体会亦有启发意义。区别于何焯、张佩纶、李慈铭等人对杜牧诗的宽泛评价，俞氏分体讨论，提出杜牧五古如《感怀诗》《杜秋诗》《郡斋独酌》《雪中书怀》《题池州弄水亭》诸篇，高骋劲出，较他体更胜，近体如《华清宫三十韵》及《长安杂题》六律，高出李商隐一头，古诗句法多取法韩愈诗文，开后来法门不少。（1951.6.28）

俞鸿筹密切关注古籍存亡情况。自日本侵华起，古籍损毁尤为严重，或是惨遭焚毁，或是不知其踪，或是论斤贱卖，俞鸿筹对此格外愤慨。日记云：“北平海王村旧书肆因营业萧条，将古本古籍论斤出售，以为包物之用。毁灭文物，一至于此，可胜浩叹。”（1949.9.27）《〈希任斋善本书目〉序》一文，将其对古书罹难的愤怒、痛心、忧虑展现得淋漓尽致：

清末迄今，书籍遭厄最烈。其流落异国者，若北宋之归静嘉堂文库，已为世所咸知；新建裘文达曰修，藏四库未进呈钞本元明小集八百余种，后归武昌柯氏，多属罕睹之笈，亦被倭人以二十万金易去。此犹流转人间或可踪迹者也。丁丑以还，则备受火燔水溺，荡析毁弃，自江乡僻壤，弥互四方。昔人所言叠以为渡、用以为炊之惨况，已有过之无不及。其中宋元版本，人所共珍，罹祸差少；至明以下甲乙之部，动辄论秤问值，割裂藉物，或竟改制粗纸，呼为还魂。近有人从析津回，携视所藉寒具之纸，赫然大字精刊《周礼》数叶也。经此浩劫，举国所存典籍几毁十之八九，数千年遗留文献，盖将垂垂尽矣。（1951.1.31）

在俞鸿筹看来，自日本侵华起，中华数千年之文献瑰宝毁去大半。他强调古籍流落异国尚可追踪购回，而火燔水溺、割裂改制给古籍造成的伤害则不可逆转。即便海晏河清，损失也难以修复。目睹这一惨剧的俞鸿筹，更懂得藏书不易，读书难得。他抄录赵孟頫藏书跋语“聚书藏书，良非易事”（1950.2.1）以表心志。同时，留心海内外的书籍收藏与流传情况，对北平图书馆、震旦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文澜阁、常熟沈氏师米斋、宁波李庆城萱荫楼、无锡孙毓修小绿天等公私藏书情况皆加记录。若有罕见版本经眼，亦于日记中详加记述。

俞鸿筹博览群书，学问渊博，喜好谈碑、治印、看画，文人趣味浓厚。深厚学养与文人雅趣共同形塑了俞鸿筹的文学风貌。其遗著《舍庵诗词残稿》存诗183首，词14首，其中题咏书册字画、金石文献之作约占八成，钱仲联赞其“与时流嘲弄风月者殊趋”。从《题正反同形象文汇录》《题说文新附汇录》《题瓶庐临董香光山水卷》《题恬裕斋校书图》《题严畸盒藏印谱》《题玉翠砚合拓本》等诗题，俞氏创作的题材特点可见一斑。俞氏笔下不乏才气与学思并显的佳作，如《题珠玉词小山词合刊本》：

破梦居士得临淄后裔重辑珠玉小山词钞合刊，较汲古所录增百余阙，可称足本。出示属题。

熨纸香匙手自亲，玉樽清唱醉芳茵。西园莫赋边屯事，灯火笙歌是解人。

莫莫休休侧艳词，岂真鬼语坠泥梨。缀旒终是闲评泊，难把知音许《罪知》。（自注：祝京兆《罪知录》论词，稍许欧晏周柳，以为缀旒。）

隽味楂梨一卷兼，低吟合共夜香添。临淄绝代词宗手，不道遗嫠月且严。（自注：李易安《词论》：“晏丞相学际天人，作为小歌词，直如酌蠡水于大海，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。叔原能知词矣，而苦无铺叙。”）

这组诗表达了俞氏对晏殊其人其词的个性化理解。其一肯定晏殊不赋边事，吟咏灯火笙歌的题材倾向。不强调宏大意义，聚焦雅士生活，暗合俞氏当下处世心境。后两首皆推尊晏殊词艺，指出祝允明《罪知录》低判晏殊词的艺术成就，并回应李清照对晏殊词“皆句读不葺之诗”“苦无铺叙”的指摘，着眼于其称赞晏殊的一面，进一步推举晏殊为临淄一地的“绝代词宗”。

又如《题任立凡山水画册》其一：“山人家住箫然山，烟云落纸皆萧然。图成见山不见画，胸中丘壑身林泉。”寥寥数语便描绘出任立凡使人身临其境的高超画技，画作给人萧然之感，俞氏清词秀句亦给人清凉疏逸之感。再如《溆居士字卷》：“蔚此豹变姿，奇气何从吐。墨池腾风雷，化作南山雾。”此诗短小精悍，形象刻画出书法作品的灵动笔势。

题咏文人雅好之物以外，与友人的交游往来是俞鸿筹诗作的另一常见主题。如下一组诗就展现了俞氏与庞蘅裳的深重情谊：

《和鹤缘丙申元日诗韵》：其一：年来贫病已能甘，粗食无妨共九三。（自注：东坡呼颖滨曰“九三郎”。）未办敷于为后饮，（自注：《荆楚岁时记》注：“敷于，音讹为屠苏。”）犹思罗缕作深谈。偶全瓦注原堪叹，懒访奇书更不贪。独喜庞翁多美意，（自注：山谷句：“庞翁迹颇亲。”）红笺细字若眠蚕。

其二：萧瑟江关纪再周，眼中日月又逢猴。（自注：曩见宋雍熙硃有“猴逢一纪，与日月易”铭语。）百年鼎鼎空分半，举世悠悠合自休。坐惜麝熏沈淑景，（自注：元日阴霾。陶诗：“沈阴拟熏麝。”）闲看鸦阵下层楼。支离已忘酬新侯，枯拥绳床乌衲裘。（自注：皮裘美句：“不知何事迎新岁，乌衲裘中一觉眠。”）

《柬鹤缘》：已叹新贫压旧贫，更嗟大耋历千辛。老成谁识汝母侮，忧患端从我有身。白鹭股难谋补肉，黄茅地误落殊珍。启期且自宽心境，（自注：《列子》：“荣启期，自宽者也。”）烦恼菩提即净因。

《悼鹤缘（己酉卒，年八十六）》：通家旧谊论三世，谦退深蒙父执推。不为才难伤老宿，却同群碎委稿莱。（自注：右军帖：“俯同群碎。”）人间苦器休回首，门外天涯绝告哀。想见寒梅蕉萃甚，此生能得几回开。（自注：室吴同庚，尚在。）

从中可知，俞庞二家三世交好，俞鸿筹对庞蘅裳的人品、才华、气质极为赞赏。二人同经乱世，但心境不同。俞氏和作表明自己已趋于闲散忘世的平淡状态，赠作则反映出庞氏仍因时运不济而郁结苦闷，俞氏劝他自宽心境。友人去世，俞氏悼作不言伤感，直言死亡亦是解脱，情谊深重若此怎会不伤感，只不过因为对友人心境有着深切共情，才会觉得离开人间苦海未尝不好。此外，《怀凤翊》表达了他对瞿凤起的理解与盛赞：“白醪揩残卷，相看意最亲。天留读书种，老作背匙人。语可列眉比，别才阿鹊频。东坡传《药诵》，巨胜亦堪珍。”还有《无恙旧有六十我满意之句乃于壬辰人日化去方五十九也作此挽之》《和隐麓见赠韵》《稚柳五十》《怀甸老》《和瘦东见怀韵》《志靖四兄七十》诸作都向读者讲述了一段又一段互相理解和关心的宝贵交谊。

总体来说，俞鸿筹作诗依靠才学，遣词造句讲求出处，喜好使事用典，这一特点在上述诗歌中已有体现。再以《赠佩苍四十九生日》为例做一说明：

正从览揆见圆蟾，应向高楼卷画帘。名士衣帔多蕴藉，新诗几砚总精严。红闺难得清斋共，素守欣看雒诵添。图取荔枝传韵

事，香山福慧本双兼。（自注：《荔枝图序》，乐天四十九岁作）。(1949.6.11)

首联“览揆”典出《离骚》，颌联化用清吴伟业《寿王子彦》诗，颈联“雒诵”出自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，尾联用白居易四十九岁作《荔枝图》一典。典实充斥全篇，目不暇接。此外，俞氏作诗还多系时事，《舍庵诗词残稿》几乎每首诗都有自注，若无注语，恐难索解。俞氏强调积累与涵养之于创作的重要性，日记己丑(1949)四月十一日云：“欲赋小诗，久索未成。白石道人云：‘思有窒碍，涵养未至也，当益以学。’”在俞氏看来，学养深厚，作诗才能信手拈来，一气呵成。将日记与诗歌对读，更能发现俞鸿筹学养与创作的互动关系。他曾从杜甫、黄庭坚诗句中提炼出“未委”这一诗歌语汇，书于日记中：“未委，未知也。杜诗：‘未委适谁门。’山谷诗：‘未委先生记得无。’”(1949.11.19)其《题汪大铁编年画册》诗有句云“未委经行处，曾破几量屐”，可谓是对该词的成功化用。

俞鸿筹曾以“养疴岑寂且随缘，终日婆婆笔砚边”（《题壬辰日记后》）来描画自己在身心疲惫之际，依然孜孜不倦地读书、著述。对幼受家学的俞鸿筹来说，提升修养、勤苦治学既是家族文化传统召唤下的习惯使然，亦是其在世变中存亡续绝的世家文人担当。

#### 四、结语

日记中的记忆，本是个体思维活动的产物。但只要日记的作者根植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，文化记忆就成为其思想及知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然而，这种文化记忆采用哪种方式书写出来，作者是可以自由选择的，像日记这样的私密写作，显然不存在与社会读者分享相关文化记忆的即时诉求，也就不存在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当下可能。而有关家族的记忆，是文化记忆中比较“公”“私”交缠的一种类型，它既是特定族群共有的，又带有明显的亲缘、私性色彩，从此角度来说，俞鸿筹日记中的家族文化记忆，固然是他个人的一次写作表达，但其中的情感和用意却是具有家族传承之责任意味的。

正如罗时进先生所言：“家族不仅仅指向物质生产、生活层面的意义，也意味着凝聚文化倾向、人文情感和文学经验的文化共同体。”<sup>23</sup>俞鸿筹日记不仅是一部个人心路传记，更是一部关于家族文化共同体的记忆史，我们从中看到了近代江南俞氏家族代代相承的文化传统，感受到了其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。

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，即其家国同构性。钱穆先生曾论：“‘家族’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……中国文化，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，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，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。”<sup>24</sup>罗时进先生亦云：“‘国家’之‘家学’往往亦即‘家族’之‘家学’。”<sup>25</sup>透过俞鸿筹关于家族的文化记忆，我们不难认识到俞氏家族对中华文化保存和建设做出的宝贵贡献，以及世家的家族教育对学术传承、文化守护的重要作用。中华文化绵延千年，长盛不衰，其传承正多赖于江南俞氏这样的文化家族。

#### 注释：

1 梅新林，陈玉兰：《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》，载于胡晓明主编：《中国文史上的江南：从江南看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70页。

2 俞鸿筹手稿日记现存七册，藏上海图书馆，时间起止为1949年元旦至1955年12月31日，后收入《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》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联合影印出版），本文所引日记皆据此影印本。

3 阿斯曼(Assmann A)著，潘璐译：《回忆空间：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33页。

4(1)阿斯曼(Assmann A)著，潘璐译：《回忆空间：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45页。

- 
- 5(2)顾廷龙等:《清代朱卷集成》第384册,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版,第3页。
- 6(3)俞钟璠:《彭城俞氏世谱》,清光绪十五年刻本,辽宁省图书馆藏,第3页。
- 7(4)郑逸梅:《郑逸梅选集》第四卷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,第990页。
- 8(5)翁斌孙著,张剑整理:《翁斌孙日记》,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,第269页。
- 9(1)参考沈鸣:《常熟“师米斋”与“希任斋”藏书事迹补遗》,《新世纪图书馆》2013年第9期。
- 10(2)参考沈芳畦:《百年常熟藏书的聚散》,常熟市政协文史委员会:《常熟文史资料选辑》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,第743-755页。
- 11(3)据郑逸梅《俞运之小传》(江苏省常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《常熟文史资料辑存(第17辑)》1990年版,第171页)及《常熟市志》(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)第四十五编《人物》“俞鸿筹”条,俞鸿筹生于光绪丁未五月十六日(1907年6月26日),卒于1972年2月1日。
- 12(4)徐雁平:《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,第64页。
- 13(5)徐雁平:《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》,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,第106页。
- 14(6)单士厘:《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初编》卷三,民国归安钱氏排印本,哈佛燕京图书馆藏。
- 15(1)郑逸梅:《郑逸梅选集》第四卷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,第990页。
- 16(2)刘海粟美术馆,上海市档案馆: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档案史料丛编》,中西书局2013年版,第五卷《恰同学年少(下)》第198页、第四卷《恰同学年少(中)》第418页。
- 17(3)刘海粟美术馆,上海市档案馆:《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档案史料丛编》,中西书局2013年版,第五卷《恰同学年少(下)》第198页、第四卷《恰同学年少(中)》第418页。
- 18(1)翁同龢:《翁文恭公日记》,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,第129页。
- 19(2)翁同龢著,赵中孚整理:《翁同龢日记》第三册,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,第1146页。
- 20(3)翁同龢著,陈义杰编:《翁同龢日记》第三册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1625页。
- 21(4)翁同龢著,翁万戈编,翁以钧校订:《翁同龢日记》第四卷,中西书局2012年版,第1663页。
- 22(1)俞鸿筹诗词遗作《舍庵诗词残稿》二卷,庞镜蓉编,钱仲联撰《俞运之小传》,谢稚柳撰序,现藏上海图书馆,1979年油印本。本文所引俞氏诗词、钱氏传语、谢氏序语,皆据此本。
- 23(1)罗时进:《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12年第1期,第164页。

---

24(2)钱穆:《中国文化史导论(修订本)》,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,第51页。

25(3)罗时进:《家族文学:何以成“学”,如何治其“学”》,《苏州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2年第4期,第114页。